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龚书铎 主编

清代理学史

上卷

史革新 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龚书铎 主编

清代理学史

史革新 著

上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理学史. 上 / 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

ISBN 978 - 7 - 5406 - 6535 - 7

I. 清… II. ①龚…②史… III. 理学—思想史—
清代 IV. B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4967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z.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本 49.5 印张 1 080 000 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06 - 6535 - 7

总定价：120.00 元（上卷、中卷、下卷）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3412044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三)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教育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编委会

主任

李文海

委员

龚书铎 王思治 经君健 程歉
杨珍 夏明方

总序

李文海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译著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

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也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如人意，除了其它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作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和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被新编的清史包涵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订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陈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

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政治前提外，唯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分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清代

学术概论》)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末，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的成败，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2003年8月8日

绪论

行書 楷書 隸書 等等

故首源者之缺于而遇目前，乃是制人生之
教育中《家教》。李里生早年攻读国学，尊崇古物，喜做
篆籀，而通晓其略古事，向宣中《家教徵李君》云所居，率
重文，以《家教》为师，《家学錄》所据，《印本》得人之“《家

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它是儒学历汉、唐经学后发展的新阶段。南宋理宗后期，理学正式确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延及元、明、清，近七百年，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深远。宋明理学，海内外研究者甚多，无论论著，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也多有阐发，而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为专门之系统著作。清代理学虽有论著阐发，但尚乏系统。钱穆所著《清儒学案》，惜书稿沉于长江，未能行世。有鉴于此，本书冀能弥其不足于万一。以下就有关清代理学的几个问题作点说明。

一 理学、道学、宋学

学界一般认为，清代学术主体为考据学（又称汉学、朴学），理学已是衰落。就清代学术总体趋向来看，也可如是说。但具体而论，理学在清代的地位和影响仍不可忽视。康熙年间，程朱理学被清政府定为官方统治思想，曾一度居于学术主导地位。清中叶，乾嘉考据学兴盛，理学的学术地位边缘化。但程朱理学所张扬的纲常伦纪，不仅为士人所效法，而且影响于城乡普通百姓。

理学，也称道学。道学之称，早于理学。《二程集》中多处言及道学，程颐在《祭李端伯文》中直接声称他和其兄程颢“倡明道学”。^① 元人修《宋史》，别创《道学传》，列于《儒林》之前，以尊

^①程颐：《祭李端伯文》，《二程集》上册，64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六子，而置陆九渊于《儒林》。据此，则道学专指程朱理学，不含陆九渊心学。

关于理学的名称，顾炎武在《与施愚山书》中说：“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① 他没有具体说明理学之名始于宋代何人。据学者的研究，认为理学之名最早出现在南宋人的文集中，如陆九渊《与李省幹》信中即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② 陆九渊所说的理学，当指宋儒讲性理之学的理学，应包括程朱理学和他的心学。

理学之名，明代流行。如冯从吾在所著《关学编》自序中说：“吾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③ 是编以张载为“关学之始”，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叙“关中道统之脉络”。在所立诸传中，既有学宗濂、洛、关、闽的，也有陆王心学的传人。可见冯从吾所谓关中理学，实合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孙奇逢于清康熙五年（1666）撰成《理学宗传》。他在《寄张蓬轩》信中说：

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三十年来，辑有《宗传》一编，识大识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

^①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顾亭林诗文集》，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 陆九渊：《与李省幹》，《陆九渊集》，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参见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③ 冯从吾：《关学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川流也。及领指示，觉人繁派淆，殊非传宗之旨，故止存周（敦颐）、张（载）、二程（颢、颐）、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子，标曰《传宗录》。^①

《理学宗传》所存十一子，不仅有程朱理学一系，也有陆王心学一脉。对于二者的态度，孙奇逢在《与魏莲陆》的信中说：“然仆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②显然，孙奇逢于二者皆尊而不敢有遗，在于调和兼尊，而其实是为陆王心学争在理学道统中的地位。他在《理学宗传叙》中将道统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期，每期又分为元、亨、利、贞四段，提出：

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元其仲尼，亨其颜、曾，利其子思，贞其孟子乎！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之贞乎？……盖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余谓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统，而孟子自负为见知。静言思之，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欤？^③

孙奇逢在这里将阳明心学视为继朱熹之后“近古之统”的第四阶

^① 孙奇逢：《寄张蓬轩》，《夏峰先生集》，《孙奇逢集》中册，72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② 孙奇逢：《与魏莲陆》，《夏峰先生集》，《孙奇逢集》中册，72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③ 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集》上册，62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段，且是直接周敦颐之统。明末清初，人们反思王学末流的弊端，于是或由王返朱，或调和朱、王，或回归经学原典。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调和了朱、王，强调其“有相成而无相悖”。

清代，理学又称为宋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说：自汉至清，“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① 这里所谓宋学，即指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理学，与专事训诂考证的汉学相对立。

乾隆、嘉庆年间，汉学兴盛，宋学衰颓，治汉学与治宋学者互相攻讦。嘉庆、道光间，汉学家江藩先后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扬汉抑宋。他在《宋学渊源记》中既强调宋学渊源于汉学：“苟非汉儒传经，则圣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又揭为宋学者“同室操戈”之短，“为朱子之学者攻陆子，为陆子之学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学兴，尊陆卑朱，天下士翕然从风”。有意思的是，作为尊汉的江藩竟为朱、陆捏合，“窃谓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也’；陆子主静，《大学》‘定而后能静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节虽异，其本则同，要皆圣人之徒也”。^② 在《宋学渊源记》中，既为宗程朱理学者立传，也为宗陆王心学或调和程朱、陆王者立传。

然而宋学又有广义，非专指理学。明人唐枢《宋学商求》的宋

^①《经部总叙》，《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②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录，1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学，即泛指宋代的学术。当代学者邓广铭在《略谈宋学》一文中提出，理学不等于宋学，应当加以区别。^① 漆侠认同其师邓广铭的见解，认为“宋学和理学之间的关系是，宋学可以包蕴理学，而理学则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支派”。他具体地指出，宋学应包括北宋的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范仲淹及其后的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和洛关理学派，南宋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及与之对立的吕祖谦、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的浙东事功派等。^② 朱伯崑在《关于宋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宋学有学术史、经学史、哲学史等几层含义。经学史上的宋学，“是宋学的本义”。而“宋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标志着中华学术发展的新阶段。它是以儒学为核心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体系，不同于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传统。一部宋学史，即是宋代儒家开创的儒学史”。^③

以上所述，说明理学、宋学均有不同含义。本书所说的理学，包含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说的宋学，是清代汉学家作为与汉学相对应的宋学，非广义之谓。

二 清代理学的分期

研究清代理学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分期的问题。

清初儒学由王返朱或调和朱、王，由宋学返汉学。至乾隆、嘉庆间，汉学独盛，居学术主流。于是论及清代学术之发展变化者，多以

^① 邓广铭：《略谈宋学》，《邓广铭治史丛稿》，1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5、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③ 朱伯崑：《关于宋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秋之卷。

汉学为脉络。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认为自顺治朝至嘉庆朝经学的衍变，顺、康二朝是“兼采汉、宋”，雍、乾、嘉三朝则“尊崇汉学，不废古训”。江藩意不在为经学的衍变分期，但判分显然。

晚清，皮锡瑞著《经学历史》，认为：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基，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①

皮锡瑞所谓“国朝经学凡三变”，是将清代经学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初，皮氏未明言起讫，但在书中他处所举清初治经诸儒，多为顺、康时人，皆属“汉宋兼采”。第二阶段为乾隆以后，但书中他处又说，“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②一起于乾隆，一起于雍正，似不一致。然此阶段为“专门汉学”、“独标汉帜”，即所谓“乾嘉汉学”时期，起于乾隆或雍正，并无大碍。只是对于皮氏所说的“乾隆以后”，不应认为只限于乾隆一朝，而是包括其后的嘉庆朝等，与第三阶段嘉庆、道光以后的“西汉今文之学”交叉。如果细加推敲，以“西汉今文之学”起于嘉庆并不准确。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始于庄存与，庄氏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早于嘉庆。皮锡瑞意在阐述清代经学衍变的历程，以及每阶段的特点，只就大段而言，不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3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